

S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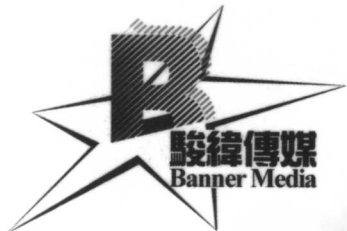
来自微观世界的恶魔

林禾枫 编著



自然界的奥秘似乎总在
躲避人类实证分析的逻辑工具，
用她委婉的方式告诉我们需要
一种整体的自然观，
而零星理论图景的拼凑相加
不可能还原自然那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
SARS 的袭击似乎是偶然的，
但是，这是否与我们认识自然的观念
出现大规模偏差有内在的联系呢？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来自微观世界的恶魔

林禾枫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SARS：来自微观世界的恶魔 / 林禾枫编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7

ISBN 7-306-01922-8

I. S…

II. 林…

III. 非典型肺炎—情况—报告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643 号

责任编辑：壬可 美术编辑：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原源 责任技编：小草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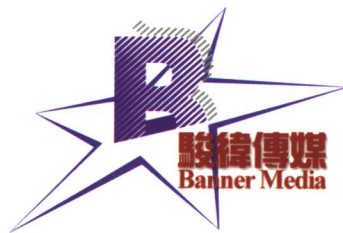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
提供与 SARS 相关的历史、
医学和法律资讯，
并非专业研究，亦非个人原创，
它是编著者个人以其多年思考为框架，
容纳、消化一定专业资料的结果，
这样做并非没有意义，
它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对民众理解 SARS 提供了一种人文视野，
一种历史思考的角度，
不求完善，只求引发更多、
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SARS 之后，我们必须反省，
本书愿抛砖引玉。

来自
微观
世界
的
恶
魔

SARS



傳媒 · 圖書出版 · 商業演出 · 教育培訓……

香港 852-21433696

廣州 8620-38466427

8620-89832629

8620-89832692

策 划: David

责任编辑: 王 可

美术编辑: 生工作室

责任校对: 原 源

责任技编: 小 草

法律顾问: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

陈满平

目录

1 序言

人类历史和流行病

- 2 新世界的发现和征服
- 4 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和历史上第一次详细的瘟疫记载
- 9 罗马帝国时期流行病
- 13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笔下的饥荒、流行病和鼠疫
- 25 黑死病的黑色记忆
- 27 旧金山 1900 年黑死病的教训
- 29 黑死病与近乎野蛮的隔离
- 30 1918 年流感大流行

人类认识疾病历史的当代认识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疾病的认识
- 36 西方历史上对疾病的认识
- 38 西方医学演进历程中的疾病观
- 42 其他文化对疾病的认识

抗生素的胜利和微生物的变异

- 54 微生物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共生关系
- 55 人类对微生物的认识历程
- 57 遗传工程生物技术固有的危险性
- 60 抗生素和病菌的抗药性
- 61 抗生素的毒副作用
- 62 超级细菌的培养者
- 63 抗生素滥用者举隅
- 64 正确使用抗生素
- 64 重视抗生素的不良反应
- 65 家庭滥用抗生素危害大

- 66 抗生素并非越新越贵越好
- 67 感冒不一定要用抗生素
- 67 发热，同用抗生素没有必然联系
- 68 慎用氨基甙类抗生素
- 69 孕妇如何用抗生素
- 69 避孕药不能与抗生素同服
- 70 病菌比人类更聪明
- 72 病人教育有助减少支气管炎抗生素的使用
- 73 关于抗生素的报道

引子：人类重新面临威胁

- 78 被暂时锁在魔瓶中的撒旦
- 78 开始复活的撒旦

疫病的开始：不为人知的故事

- 82 遭遇 SARS 的无名平民
- 82 得寸进尺的 SARS
- 83 河源：SOS
- 84 中山遇袭 广州惶恐

恶魔悄然而至

- 86 肆意蹂躏
- 91 漏诊的上海首例 SARS 病人
- 91 山西悲歌
- 95 不平等的战争
- 99 中西部的阴影

科学家追寻 SARS 病原的历程

- 104 SARS 真凶：冠状病毒
- 105 衣原体：被怀疑的凶手
- 106 临床治疗对“衣原体”的否定
- 107 冠状病毒现身
- 109 中国科学家相同的发现
- 111 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

中国官方对 SARS 的表态

- 115 刘建超就非典型肺炎、伊拉克战争等答记者问

- 115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不得瞒报“非典”疫情
- 116 温家宝检查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非典”防治工作
- 117 温家宝对云南“非典”防治工作提出五点要求
- 118 吴仪“受命于危难”
- 121 北京新市长“能办事”
- 123 中药等价格疯涨 河北政府重锤敲醒奸商暴富梦
- 125 中国宣布大规模减免税以减轻萨斯对经济的冲击
- 125 吴仪会见 WHO 总干事
- 127 吴仪日内瓦第 56 届世界卫生大会 5 日行程直击
- 130 加快防治“非典”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国家增加 8 亿多元专项投资
- 131 国家工商总局曝光防“非典”虚假广告 9 个典型案件
- 132 卫生部副部长分析当前控制“非典”关键环节与要点
- 133 SARS 经济影响显现 政府初步对策出台

“起死回生，再世华佗”治疗 SARS “毒王”的惊险经历

- 137 “毒王”周作芬
- 139 落入 SARS 恶魔之手
- 140 “起死回生，再世华佗”

蒋彦永的故事

- 145 一个普通的诚实公民
- 146 为民请命的人
- 147 书香世家 身世浮沉
- 148 回归普通人的德行

尊重事实 以人为本的钟南山院士

- 150 临危受命
- 150 收治危重病人，制定医疗方案
- 155 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事实
- 158 医德、人格和操守

SARS 阴影下的众生相

- 165 救命仪器辗转 10 小时终到地坛医院
- 166 SARS 封锁下的情感生活
- 168 停业、延期、取消活动 上海娱乐消费业面对“非典”时期
- 170 京城 SARS 时期的日常生活
- 173 北京日记
- 174 发“非典”财

- 175 以“非典”的名义作秀
- 176 都市取景·观陋习：举手投足间辱没面皮
- 177 都市取景·看分餐：推杯换盏间共享口水
- 179 易被忽视的角落
- 181 城市形象与“非典”影响下的上海
- 184 “非典”时期的幽默：四大经典爱情之“非典”版
- 185 中国最早记载“非典”的文献
- 186 预防“非典”秘方
- 186 “非典”带来的好处
- 186 “非典”时期最可恨的人
- 190 文学大师笔下的疫病
- 192 “非典”是否直接影响性生活
- 192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 中国富豪们在干什么？
- 194 人有病，天知否？广州抗击“非典”纪实
- 198 吃吧，“勇敢”的人们！

附录

- 200 从草药到致命的西药：西方医学对自然界的战争
- 2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点内容解读
- 219 “非典”已列入《传染病防治法》 违者可判7年刑期
- 219 卫生部办公厅发布农村地区“非典”防治技术方案(全文)
- 228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医院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过程中做好正常医疗工作的通知
- 228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痊愈出院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 229 财政部关于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的通知
- 230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关于防治“非典”期间对部分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 231 关于免除直接参加抗“非典”工作的医护人员等在抗“非典”期间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逾期罚息和复利等问题的紧急通知
- 23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23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236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人临床诊疗工作的紧急通知
- 236 卫生部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序言

中国国内研究流行病历史的专著尚属阙然。当 SARS 以猝不及阶之势袭击人类社会之时，为公众提供有关流行病、医学观念的演进以及药物治疗的历史资讯，使公众对 SARS 的认识具备一种整体的历史眼光，应该说是急迫而必要的。民众对历史的了解，对当今威胁人类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认识，有助于他们面临类似的危机时采取更积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有助于政府安定社会局势所采取的措施的贯彻和实际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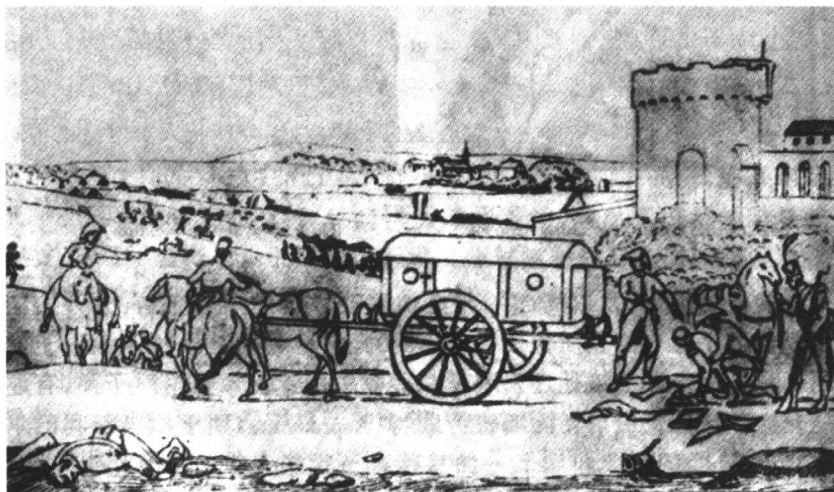
本书分历史篇和 SARS 篇，并选编了一些文章作为附录，以期寻求 SARS 在整体历史和人类对疾病认识历程中的现实定位。今天的人类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为人类的健康和幸福作过光明的承诺：抗生素的发明为人类彻底征服疾病投下壮丽的光环，而且人类基因组工程又为彻底解脱病苦创造着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基因组工程暂且不说，临床医学的实践告诉我们，抗生素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对它的期望值，因为微生物的世界似乎更为广阔，变化无常。我们的思维局限在解决问题上，局限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封闭立场上，而不是将人类的生存放在更大的范围中去思考。于是，自然界的奥秘似乎总在躲避人类实证分析的逻辑工具，当实证分析刺穿一定奥秘时，她会提示一些现象，令这种结果自我解体、封闭；缺乏整体认识的理论只能在局部的范围内有效，放入更大的框架中就会顾此失彼。所以，自然是用她特有的委婉方式提醒我们一种整体认识的，零星的、局限的理论图景的拼凑相加，不可能还原自然那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

SARS 的袭击似乎是偶然现象，可是这是否与我们认识自然的观念出现了大规模的偏差有内在的联系呢？本书无力对此作出解答，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和执着。

SARS 的来临至今原因不明，虽然科学界找到了致病病原，但其发生有如谜题。钟南山院士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曾忧虑地说，广东的 SARS 患者 96% 无以往接触史。本书对 SARS 袭击中华大地根据媒体的报道资料作了简单概要的描述，关注重点在于医学界和科学界对抗 SARS、治病救人付出的殊死努力，以及中国政府抗击疫病的具体应对措施。书中重点描写了两个在本次流行病中表现突出的人物：蒋彦永教授和钟南山院士。这两个人或许将永远被后人记住。

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提供与 SARS 相关的历史、医学和法律资讯，并非专业研究，亦非个人原创，它是编著者个人以其多年思考为框架，容纳、消化一定专业资料的结果，这样做并非没有意义，它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对民众理解 SARS 提供了一种人文视野，一种历史思考的角度，不求完善，只求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SARS 之后，我们必须反省，本书愿抛砖引玉。

人类历史和流行病



新世界的发现和征服

在人类从事征服自然的伟大事业中，自然并没有真正屈服过，而技术的力量有时被我们过分夸大了。微生物的世界是一度被我们的历史学家忽略的世界。

我们居住的地球能够供养人类生息繁衍的大地被海洋分割成不同的陆地，而在辽阔的陆地上，又有荒蛮的沙漠构成交通的阻隔，仿佛造物主有意让不同的人类种群孤立隔绝，互相不能交流往来。文明的发展赋予人类的能力不断增强，阻隔的局面被逐步打开，不同的人类种群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交融、交流，甚至通婚，形成新的族群。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多面的变化历程，由于我们观察的兴趣所在，历史研究过多地注意了外部器物的进步，政治制度的演进、战争和屠杀等等主题；科技带给人类的享受和利益、自然而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人类智慧对自然的征服成为我们自我确证的最辉煌依据。不错，近代历史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除了征服自然，人类还在借助技术的力量征服着其他族群。

其实，在人类从事征服自然的伟大事业中，自然并没有真正屈服过，而技术的力量有时被我们过分夸大了。微生物的世界是一度被我们的历史学家忽略的世界。

获普利策奖的生理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以其渊博的生物学知识视角，揭示了病菌、病毒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系。

近代500年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构成这部著作的主题。戴蒙德试图

回答一个困扰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数百年的问题,近代西方借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使新大陆土著畏惧的力量,其实从另外一方面看,微生物的力量却是决定性的。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的病毒和病菌使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以及大批非洲和大洋洲与世隔绝的土人几乎陷入灭顶之灾,新大陆却没有能够对旧大陆居民产生致命威胁的病毒或病菌,这个问题就成了作者关注的中心。

人们知道,欧洲殖民者传播到新大陆的多种疾病,特别是感冒和天花,夺走了当时新大陆居民90%的人口,远远超过殖民者用枪炮杀害的人数。虽然从新大陆传播到欧洲的梅毒一度引起麻烦,却不足以致命。

戴蒙德为此提出了一种生物学的证据: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病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旧大陆农耕社会里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新大陆居民却没有发展出发达的饲养业和种植业,人口居住也不如旧大陆集中,所以,新大陆居民未曾遭受过旧大陆居民定期发作的流行病。

农耕社会为传染病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因为,种植业和饲养业的产生打破了生物各自生存的局限,人类开始与自然状态的动物接触。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通常局限在不同的生物群体中,一般对它们寄生的宿主没有危害。而群居的农耕社会使不同生物身上寄生的微生物也得以交流,拥挤的居住环境、排泄物的大量堆积等等,最有利于微生物的繁衍。大规模的家畜家禽饲养为微生物提供了这种繁衍条件。人类饲养的动物越多,动物与人类之间相互传播身上的微生物的机会也就越大。微生物在其原来的宿主身上可能不会产生问题,但微生物相互的传播,有机会产生新的具有危害力的微生物。这样,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大规模致命的传染病,包括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鼠疫、麻疹、霍乱,再加上近年来的爱滋等等,都是人类从动物那里承继过来的。

戴蒙德指出,病菌病毒在历史上的作用被人们大大低估了。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传染病杀死的人,远比战争或者其他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多。以战争而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部分战争里死亡在刀枪之下的人都不及死于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人数。的确,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下的阴影,是其他灾难难以比拟的。比如13世纪欧洲的鼠疫也就是黑死病,曾经夺去了那里1/3人口的生命。到了20世纪,1918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流感,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而打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死亡人数也就是1000万人。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旧大陆比新大陆产生的传染病要多许多倍。自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起,旧大陆各个早期文明就开始驯养各种野生动物。比如西亚地区在一万年前就有了绵羊、山羊等家畜,中国人在9000多年以前就开始养猪。旧大陆的家畜家禽有数百种,而新大陆的

近代西方借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使新大陆土著畏惧的力量,其实从另外一方面看,微生物的力量却是决定性的。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的病毒和病菌使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以及大批非洲和大洋洲与世隔绝的土人几乎陷入灭顶之灾,新大陆却没有能够对旧大陆居民产生致命威胁的病毒或病菌,这个问题就成了作者关注的中心。

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通常局限在不同的生物群体中,一般对它们寄生的宿主没有危害。而群居的农耕社会使不同生物身上寄生的微生物也得以交流,拥挤的居住环境、排泄物的大量堆积等等,最有利于微生物的繁衍。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传染病杀死的人,远比战争或者其他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多。以战争而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部分战争里死亡在刀枪之下的人都不及死于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人数。



印第安人却只驯养了驼马等少数几种动物，而且在哥伦布之前基本没有大规模饲养业。因此，新大陆传染病产生的机会远远少于旧大陆。

然而，旧大陆的居民在历史上虽然饱受传染病之苦，却发展出了抵抗不同传染病的各种抗体。得过伤寒或天花而大难不死的人有终身免疫力，得过感冒的人对流感也有一定的抵御能力。有不少免疫能力还能传给后代。传染病对旧大陆居民尽管造成周期性的打击，而感染后的死亡率却在每次打击后递减。当年新大陆的居民却没有这种幸运。他们身上缺乏抗体，染上了旧大陆人带去的病菌病毒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超过90%的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相继死亡，只剩下不到10%的人躲过疾病的魔掌。今天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批幸存者的后代。

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和历史上第一次详细的瘟疫记载

希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不仅以灿烂的文化艺术闻名于世，而且还以其军事和战争生成之早与发展之快而闻名全球。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两个城市国家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展开了一次著名的大搏斗，结果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

在这次战争之前，希腊还与波斯进行了一场为期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希波战争的最后一年，雅典联合大量希腊城邦国家组织了攻守联盟。战后，希腊人担心波斯人可能卷土重来，没有把这个同盟解散。这时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渐把同盟变成了发展自己利益的海上帝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动用了同盟国金库的资金，试图把其他同盟国都降至臣属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镇压，把它当作被征服国，接管其海军，勒索其贡赋。雅典的横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疑虑。担心雅典不久就会把其霸权扩张至全希腊。当时雅典是民主政制的、进步的、城市的、帝国主义的、文学艺术繁荣发达的国家。斯巴达却是贵族政制的、保守的、农村的、地方性的、文化鄙俗落后的国家。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双方都想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扩大到其他希腊城邦。雅典支持各邦的民主派，斯巴达支持各邦的贵族派，相互敌对、各不相让。经济上双方为争夺奴隶、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断发生争端。双方政治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终于使大部分域邦都卷入了一场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科林斯与其殖民地克基拉发生争端。公元前433年，雅典出兵援助克基拉，逼科林斯退兵。公元前432年秋，伯罗奔尼撒同盟集会，在科林斯代表鼓动下，向雅典提出强硬要求，包括要她放弃对提洛同盟的领导权，遭雅典拒绝。公元前431年3月，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当时斯巴达方面有步兵、骑兵约3.5万人，强于雅典。斯巴达的战略是发挥陆军优势，并鼓动提洛同盟成员国叛离，达到其削弱

希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不仅以灿烂的文化艺术闻名于世，而且还以其军事和战争生成之早与发展之快而闻名全球。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两个城市国家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展开了一次著名的大搏斗，结果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

和孤立雅典的目的。同年5月，斯巴达国王阿基丹姆率军侵入阿提卡，对雅典乡村恣意蹂躏，大批农民拥入雅典城。雅典执政者伯里克利的对策是：陆上取守势，海上则取攻势，派舰船侵袭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鼓动希洛人暴动，逼敌方求和。公元前430年，雅典城内人口密集，发生严重瘟疫，死者甚众。

根据修昔底德的回忆和记载，那场瘟疫在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降临，通过地中海的商旅船队依次流传到埃及、利比亚、波斯帝国之西的爱奥尼亚诸行省，最后于公元前430年的春天在希腊世界的文明重镇雅典骤然暴发。那时，雅典宿敌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引军兵临雅典城，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二年。这时的雅典，深受自然和人事的双重窘迫，似乎末日将至。很多人想起斯巴达人在战争伊始从德尔菲神庙求得的那个可怕的神谕：斯巴达人问神是否可以和雅典人进行战争，神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说他将保佑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向神祈祷，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雅典的覆亡似乎是神所注定的，战争之初的那场瘟疫像是天神宙斯藉由玩忽职守的爱比米修斯抛给人间的潘多拉和她装满罪恶的魔盒（荷西俄德：《工作与时日》，pp.60~105）。

那场瘟疫很可怕。斯巴达的围城军队发现雅典人忽然建造起了无数的新坟，诧异之下询问雅典的逃兵才知道瘟疫正肆虐城中。阿基达马斯国王急令撤兵，伯罗奔尼撒战争暂告停火，被死亡笼罩的雅典城更显孤单无助。

城里死了很多很多人，连雅典的“第一公民”、民主领袖伯里克利也未幸免于难。修昔底德亲身经历了那次人类历史上可怕的瘟疫，并以他非凡的叙事能力详细记录了瘟疫的经过，或许他的记载就是世界上第一次翔实的瘟疫流行的历史记忆文本。

修昔底德的描述具有真正的历史穿透力，把那场惨烈的灾难带到我们的眼前，好像亲眼所见：医生们对那场瘟疫束手无策，他们不知道瘟疫的来源，不知道医治的方法。医生们大批地死去，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太多。雅典城曾经一度云集哲人、学人、诗人、艺人，但在瘟疫中，所有人类的知识、技艺、聪明、谋略一概没有用处，连人类所能臻至的最高技艺——宗教也不例外：当为病痛所苦的百姓在祈祷中相继死去的时候，他们便抛弃了神，没有信仰地等待死亡。深谙世事的哲人苏格拉底早早终止对话，退出广场（agora），摇身一变，混进雅典国民军队，终于活过瘟疫，后来他当了逃兵，又活过了那场战争。

根据修西底德的回忆，瘟疫的第一个症状是头部发烧，既而眼睛变红，发炎；口中喉舌出血，呼吸困难；干咳，嗓子变哑；胸部疼痛，后延至腹部，导致呕吐，全身抽筋；皮肤呈红色和土色，并有脓疮和溃烂；体外低热，但是体内高热，以至于病人不得不裸体浸泡冷水中；发病7天之后，体内高热导致腑脏溃烂，病人开始死亡。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或者在街上打滚，或者拥挤于泉水周围，因为他们口渴。

根据修昔底德的回忆和记载，那场瘟疫是在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降临，通过地中海的商旅船队依次流传到埃及、利比亚、波斯帝国之西的爱奥尼亚诸行省，最后于公元前430年的春天在希腊世界的文明重镇雅典骤然暴发。那时，雅典宿敌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引军兵临雅典城，举世闻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二年。这时的雅典，深受自然和人事的双重窘迫，似乎末日将至。

医生们对那场瘟疫束手无策，他们也不知道瘟疫的来源，不知道医治的方法。医生们大批地死去，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太多。

文字是人类的技艺，它代表文明。然而在这里，与文字隐隐对峙的是狗、羊、苍蝇，似乎在表明文明的无能为力。



在渗透着末世死亡气息的“平等”和“权利”的呻吟声中，修昔底德记下的是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

死亡的惨状几乎使修昔底德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他悲伤地说：“这场瘟疫不是人类的文字所能描述的。”修昔底德一度避而不提那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人，转而录下了死人尸体旁的野兽：“吃人肉的鸟兽一旦尝了尸体就必然死去，所有食肉的鸟类因此在雅典绝迹。”修昔底德既而提到了三种生物：狗、羊、苍蝇。他说：“狗提供了观察疫情的最好样本，因为它们是和人住在一起的”；“由于看护病人而染病的人像羊群一样成群死去”；“流动在城里的乡下人在炎热的初夏拥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茅屋里，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

修昔底德似乎在暗示，我们不能通过文字，而只能通过对其他生物的生活情态来认识这场瘟疫。文字是人类的技艺，它代表文明。然而在这里，与文字隐隐对峙的是狗、羊、苍蝇，似乎在表明文明的无能为力。修昔底德不动声色地告诫后人：文字是属人的，它无力摹写非人的事情；正如文明是脆弱的，它不能阻止人类在极限情境中落入野蛮和残酷。

人的野蛮化意味着人堕落为兽。修昔底德在对雅典城里的野兽的回忆中暗示了瘟疫怎样使人堕落成兽。然而这仅仅是身体意义上的非人化、野蛮化。让修昔底德更为沉痛的是雅典人的灵魂的野蛮化。瘟疫所消灭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了雅典人的灵魂德性，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脆弱、自私和种种邪恶乘势复出。修昔底德写道：

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病人由于无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

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命运女神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富人们突然死亡，而他们的财富却被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继承，因此雅典人公开地铤而走险，行放纵之事，这种行为在过去人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的。人们决定迅速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短暂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法的畏惧和对人法的服从都没有约束力了。关于神明，人们认为敬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目睹了好人和坏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每个人反而觉得，瘟疫已经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判决。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快活，这是自然的。

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

从死亡里诞生的“自然权利”

在渗透着末世死亡气息的“平等”和“权利”的呻吟声中，修昔底

德记下了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而使人之成为人的正是人法和神法：前者保证了人的政治本性（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者使人区别于野兽（荷马、荷西俄德、埃思库罗斯）。修昔底德继续回忆了那些“无法无天”的雅典人怎样沦为野兽：

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的德性

这场灾难有如此压倒的力量，人们陷于绝望中，对人法和神法不再关心。昔日遵守的丧葬仪式不再遵守了。许多人缺乏埋葬所必需的物品，因为他们已经埋葬了很多死去的家人。因此，他们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新逝的亲人。他们跑到别人已经搭好的火葬堆前，把他们的死者在上面，然后点火焚尸。或者，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的时候，就把他们亲人的尸体扔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匆匆跑开。

通过对雅典人可耻的葬礼的回忆，我们看到，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的德性；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正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东西最能深刻地表明人之为人的“人性”（*humanitas*），那个东西就是诗人荷马曾经用以结束其《伊利亚特》的东西：葬礼（荷马：《伊利亚特》，p.804）。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这是一个藏在荷马史诗中的古老讯息，它在后来以虔敬和正义而闻世的罗马人的拉丁语言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人”（*humanus*）和“黄土”（*humus*）、“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修昔底德的回忆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灵魂的野蛮，亦即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它对文明的世界构成永恒的挑战。

这样，修昔底德的回忆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灵魂的野蛮，亦即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它对文明的世界构成永恒的挑战。总会有一些人在疗救被瘟疫所摧残的身体，那就是医生；也总会有些人在疗救被野蛮化的灵魂，那就是政治家（*politicus*）。在人法和神法织就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或许就是政治家的技艺和使命。

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在其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重申了这种政治家的使命：当时，瘟疫渐退，斯巴达再次陈兵雅典城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硝烟又起。活下来的哲人们又出没在广场上，传播着古怪危险的生活教条。而大病初愈的雅典人心灰意懒、无心恋战，民主政体的所有缺陷和丑陋暴露无遗，雅典海军大将特米斯托克利创下的帝国文明基业在伯里克利手中岌岌可危。在他最后这一次演讲中，伯里克利像多年以后在叙拉古城下面对溃败如丧家犬的雅典远征军的大将军尼西阿斯的最后一次演讲一样，要求雅典人与神和解、与城邦和解，守住希望，守住文明，守住雅典文明的庄严：

雅典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们。我知道你们怨天尤人的原因，但我认为，你们的这样做是不正义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个人在国家顺利前进时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得到满足而国家正

瘟疫后的第二年，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与世长辞。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再度举兵，横穿科林斯地峡，进犯雅典郊野阿提卡。



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一个人在私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他也一定会被卷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安全，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其不幸的私生活中恢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能够安静地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进行战争是绝对愚蠢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选择——不是在屈服中成为奴隶就是冒险以求生存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冒险而不是屈服。雅典人！你们不该悲伤，不该怨天尤人，不该被那些政治冷淡的哲人和鼓动家牵着鼻子走进歧途。这些人比刚刚过去的瘟疫还可怕。瘟疫夺走的只是我们雅典公民的身体，但这些人将毁掉我们的公民德性，从而使雅典文明趋于真正的灭亡。这些人表面上生活在孤独和自足之中，但其实他们的生存完全建立在雅典公民对城邦的保护之上。在一个被敌人控制的城邦里，这些人可以安稳地做奴隶，但在管理着一个帝国文明的雅典，这些人只是毫无用处的寄生虫。雅典人！驯顺地接受神明赐予的灾难，勇敢地抵抗敌人！——这是雅典人的古老习惯和德性，它是正义的。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它都是真正的力量。记住，你们是一个伟大城邦的公民！

瘟疫后的第二年（前329），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与世长辞。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再度举兵，横穿科林斯地峡，进犯雅典郊野阿提卡。而雅典城群龙无首，个人野心弥漫朝野，两百年前大立法者梭伦创立的民主政体似乎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体形态：乱民之治。整个国家陷入修昔底德看来比“外侮”更可耻的“内争”之中。“内争”（stasis），这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痼疾的东西，在16世纪被“胡格诺”宗派内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大法学家博丹（Jean Bodin）眼里正是国家的“致死瘟疫”（pestilentia capitalis）！

修昔底德这样回忆了有些劫后余生的雅典人：他们活了下来，但却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也不认识往日的朋友和敌人。瘟疫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5年。战争最终以雅典城墙的倒塌告终，雅典帝国国父特米斯托克利的伟业终于烟云过眼。在修昔底德的回忆中，他不动声色地总结了帝国败亡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雅典人丧失了对自我的认识（西西里远征）；其二，雅典人失去了往日的朋友（优比亚的反叛）。这是雅典瘟疫流行的情况。而雅典以后的命运如何呢？

公元前427年前后，米蒂利尼等盟邦反叛雅典，陆上形势对雅典不利。公元前425年，雅典海军占领了美塞尼亚西岸的皮洛斯及其附近的斯法克蒂里亚小岛，斯巴达亦陷困境。公元前422年，双方在安菲波利斯激战，雅典主战派首领克里昂与伯拉西达均战死。公元前421年，雅典主和派首领尼西阿斯与斯巴达缔结《尼西阿斯和约》。条约规定：交战双方退出各自占领地，交换战俘，保持50年和平。然而，导致战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公元前415年5月，雅典由阿尔基比阿德斯与尼西阿斯等率领战舰130